

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思想及其启示意义

——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及实践探析之一

刘重来

提 要：卢作孚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是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持续时间最长（1927~1949），成效突出的一个。其重要原因是卢作孚将“乡村现代化”作为其乡村建设运动的宗旨和理想目标；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建设方式和实践方针。两者相辅相成，成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持续不衰的动力，也成为在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取得与众不同较大成就、较好成效的重要原因，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西部大开发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卢作孚 乡村现代化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启示意义

作 者：刘重来 西南大学教授，《卢作孚研究》主编（重庆 400715）

美国著名史学家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论述了发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场规模大、波及面广、参加者众多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后，不无感慨地说，这些乡建运动尽管一时轰轰烈烈，但“最终都遭遇不佳，日本人的入侵则把它们全部清除干净”^①。但费正清并不知道，事实上并没有“全部清除干净”，因为在中国西南部，由卢作孚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从二十年代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也许这里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中唯一没有间断的延续之地。

20 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末，由卢作孚主持的，以重庆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由于地处偏僻、相对闭塞，在当时信息不灵的年代，其乡村建设影响，远不如已名满天下的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在中国东部和中部开展的乡

^①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70.

村建设那么显眼和备受关注。但它却是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持续时间最长（1927~1949），成效突出的一个。卢作孚“乡村现代化”的乡建宗旨和理想目标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方式，不仅使其乡村建设能够持续不衰，而且也确实使整个嘉陵江三峡地区（以下简称峡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使北碚这个昔日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小乡场，在十几年间建设成“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①，被陶行知誉为“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②。

1927年2月15日，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又被主政四川的军阀刘湘任命为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负责峡区治安联防。所谓峡区，是指嘉陵江由合川至重庆间的小三峡（沥鼻峡、温塘峡、观音峡）地带，处在江北、巴县、璧山、合川4县结合部，辖39个乡镇，人口10万，面积约500平方公里，其地势险峻，交通闭塞、贫穷落后。由于是“四不管”之地，故盗匪猖獗，所以在北碚设峡防局，为一个治安联防机构。卢作孚作为峡防局局长，主要职责是清剿土匪，维护一方治安。但他却借此难得机会，以峡区为平台，开展了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

一、“乡村现代化”——卢作孚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

2009年，有位学者为一部内容是新农村建设与实践的书写序，序言的第一段话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农村现代化。农村现代化不了，谈中国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③然而谁能想到，这样的论点，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人明确提出并付诸实践，此人就是卢作孚。

1949年底，随着重庆北碚的解放，卢作孚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也随之戛然而止。与此同时，北碚管理局向前来接管的军管会递交了一份《北碚概况报告书》，详述了自1927年以来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的概况。令人瞩目的是，在当时政治风云突变的压力下，在其《前言》部分，仍详述了卢作孚乡村建设的宗旨和理想目标：

“北碚的经营是由卢作孚氏根据其《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卢作孚1934年8月2日至11日逐日在《大公报》连载之文——笔者）一文的理论，

^① 梁漱溟. 怀念卢作孚先生[J]. 名人传记, 1988(5).

^② 陶行知. 在北碚实验区署纪念周大会上的讲演[A]. 陶行知全集(3)[M].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5: 311.

^③ 司马云杰.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对接——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序[A]. 辛秋水.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对接——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 1.

想以此为现代集团生活的第二个试验（第一个试验为成都通俗教育馆，第三个试验为民生实业公司），在这穷僻的山间水间点缀着几桩现代的文化事业和经济事业，描摹出一幅现代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的轮廓画，更进而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科学的、美丽的社会理想，让人们勾起一个现代中国的憧憬来，以推进国家现代化的经营。”^①

短短的一段话，竟有 5 个“现代”词语穿插其中，充分体现了卢作孚乡村建设的“现代化”思想。

而卢作孚明确提出“乡村现代化”则是在 1934 年，距他发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仅 2 个月，然而此时他已在嘉陵江三峡地区推行乡村建设运动 7 年半了。这年 10 月，卢作孚在《中华教育界》发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这是他继 1930 年 1 月在《嘉陵江报》发表《乡村建设》一文之后又一篇论述乡村建设的专文。此文之所以重要，是卢作孚在文中首段，就开宗明义阐述了他开展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现代化”，而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就必须“赶快将这乡村现代化起来”，从而正式提出了“乡村现代化”思想。他写道：

“四川嘉陵江三峡是在嘉陵江流域重庆与合川一段间，跨在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的境界。我们凭借了一个团务机关——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凭借局里训练了几队士兵，先后训练了几队学生，在那里选择了几个点——北碚、夏溪口以至于矿山北川铁路沿线——试作一种乡村运动。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里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和灾变。中华民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乡村现代化起来。”^②

可以说，在整个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把“国家现代化”延伸到乡村建设中，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乡村现代化”的乡建宗旨和理想目标，并付诸实践，卢作孚是第一人。

为了实现“乡村现代化”，卢作孚又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和建设模式。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之所以成就大、成效好，是与卢作孚独树一帜、高瞻远瞩的“乡村现代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村建设思想分不开的。

^① 北碚管理局. 北碚概况报告书（1949）[J]. 卢作孚研究，2005（1）：54.

^② 卢作孚. 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53.

卢作孚为什么要强调他在嘉陵江三峡地区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既不是“如何去改善和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是“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穷困和灾变”呢？他之所以这样说，是有所指的。当卢作孚在撰写此文时，在中国大地上，乡村建设运动正处在如火如荼的高潮之中。据统计，“1934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达600多个，它们建立的实验点、实验区有1000余处”^①。其中著名的有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陶行知在南京晓庄，黄炎培在江苏昆山，高阳在无锡黄巷，彭禹庭在河南镇平，江苏农矿厅在镇江黄墟，内政部在上海俞塘，苏州青年会在苏州唯亭，福建教育厅在福建闽侯，顾君义在秦县等地进行的乡建实验^②。但这些乡建实验大多“是以乡村的教育工作为目标”^③，还有极少数的如章元善主持的华洋义赈会是在乡村推行义赈救灾为目的。无怪著名经济学家陈序经在这一时间考察了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后感叹地说：“照我个人的观点，今日所谓乡村建设的工作还是注重在教育方面。”^④

而惟有卢作孚在嘉陵江三峡推行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不仅是为“国家现代化”而“要赶快将这乡村现代化起来”，而且是要供中国“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经营的参考”。也就是说，卢作孚虽然身在偏僻闭塞的嘉陵江三峡搞乡村建设，而他的雄心壮志，却是为整个中国农村搞出一个“乡村现代化”的样板来。这是何等雄伟的气魄！何等高远的目光，何等开阔的胸襟！

可以说，“乡村现代化”是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的核心，是卢作孚推行乡村建设运动的终极目标和崇高理想，也是他主持乡村建设实践活动的高度概括，更是他与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不同之处。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乡村现代化”之路

那么，如何实现“乡村现代化”呢？卢作孚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要把经济建设放在其他各项建设的首要地位。1936年11月，即卢作孚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已十年之时，他发表了《中国应该怎样办》一文。文中不仅对中国当时严酷的现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更对中国的未来，从国防、产业、交通、文化、人民、社会等方面确定了一个理想的发展目标。而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卢作孚提出了三点意见：“（1）集中全力于建设。（2）集中全力于生

^① 乡村建设经验（2）[M]. 上海：中华书局，1935：19.

^② 各地乡村改进试验区之消息[N]. 嘉陵江日报，1931-9-1.

^③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07.

^④ 余定邦. 陈序经文集[M].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311.

产建设。(3) 在第一期, 尤其是集中全力于有关国防的生产建设。”^①这三个“集中全力”非常充分地体现了他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1944年, 抗战即将结束, 卢作孚在思考中国战后该如何建设时, 写了《论中国战后建设》一文。此文的思想就是“建设应以经济为中心”。他认为战后中国的建设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政治方面, 要求成功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民主国家, 以实现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 二是“经济方面, 要求工业化, 人民的生活水准提高, 以实现民生主义”; 三是“文化方面, 要求教育普及, 人民的文化水准提高, 使能完全实现三民主义”。

然而卢作孚认为“这三方面的建设诚当并重, 但更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更当集中一切力量于经济建设”。他认为全国上下, 方方面面, 都应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施: “政府机关是用以管理经济建设的, 法律是用以保障经济建设的, 教育是用以培养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人才的, 科学研究是用以克服经济建设所遭遇的困难的。”^②也就是说, 政府、法律、教育、科研等等都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卢作孚还进一步回答了“为什么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由:

“第一, 任何建设, 政治的或文化的, 皆应以经济建设为基础。政府要管理一个极大的国家, 必须依赖铁路、公路、航路的运输便利, 电报、电话的通讯便利。要能抵御侵略, 必须有强大的陆海空军, 必须有大量的大炮、坦克、军舰、飞机的装备, 必须有大量制造大炮、坦克、军舰、飞机的工厂, ……因此, 必须首先着重经济建设, 尤其发展工业, 否则一切皆感空虚, 皆成问题。第二, 必须增进人民的富力, 乃能增进人民对于国家完纳赋税的负担力, ……故必须先致力于经济建设, 增进人民的负担能力, 而后其他建设乃能追随或并驾齐驱。第三, 经济活动为国家最大多数人所必须参加的活动, 一个国家只需最少数人作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对于最大多数人从事的经济活动, 应首先予以帮助, 故应先致全力于经济建设的运动。”^③

必须指出, 卢作孚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虽然是在1944年, 但实际上他从1927年开始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之时, 就把经济建设放在其他建设之首。1930年他率队出川考察期间, 多次给峡防局同仁写信, 强调

^① 卢作孚. 中国应该怎样办[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451.

^② 卢作孚. 论中国战后建设[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603.

^③ 卢作孚. 论中国战后建设[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603~604.

峡区乡村建设首先要抓好经济建设。他强调“峡局事业（指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事业——笔者）终不应仰赖于人，弟到此竭力留意生产事业，以为根本自立之计”^①，“峡局之事业要图巩固，只有自造生产事业”^②。他要求峡防局机关紧缩开支，甚至暂不发月薪，集中资金购买农业机械等设备，他表示“冒此危险，下此决心，实为峡局根本问题应有妥当解决，应建其基础于生产事业”^③上。这“建其基础于生产事业”正体现了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无怪著名爱国者杜重远1931年来到峡区参观，看到卢作孚乡村建设有“二十年内之计划（今已四年），即充实内容，深入社会，以全力建设经济基础”^④。这“全力建设经济基础”是再清楚不过表明卢作孚的乡村建设在最初阶段就已把经济建设放在其他各项建设之首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是邓小平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和英明决策。而卢作孚早在民国时期就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并付诸实践，我们不能不叹服卢作孚的远见卓识。

三、设计嘉陵江三峡“乡村现代化蓝图”

卢作孚不是一个“空想”家，也不是一些人所称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乡村建设思想博大高远、内容丰富，既有“乡村现代化”的理想追求和远景目标，又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设计蓝图，更有周密而切实可行的实施规划。从他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一开始，他对峡区的未来，对峡区的“乡村现代化”就有一个全面、系统、可实施的规划。

早在1929年12月，即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的第二年，他就在峡防局举办了一次名为“将来的三峡”的展览会。这次展览，实际上是卢作孚对嘉陵江三峡地区的“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最初构想：

“（一）教育：设立科学院——内有气象台、理化实验室、植物馆、动物馆、地质馆、社会科学馆。

普及小学教育——小学校有试验室、学校校园、运动场、陈列室、图书室。

普及社会教育——每场（指乡镇）皆有图书馆、博物馆、讲演所、运动场。

^① 黄立人. 卢作孚书信集[M].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181.

^② 三峡染织工厂业务概况[N]. 嘉陵江日报, 1931-1-22.

^③ 黄立人. 卢作孚书信集[M].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200.

^④ 杜重远. 从上海到重庆[A]. 狱中杂感[M]. 上海书店, 1983: 186.

(二)交通：延长北川铁路到渠江、建筑嘉扬马路——由嘉陵江到扬子江，普及乡村电话，普及乡村邮递。

(三)经济：用机器解决采煤问题，创设水门汀厂，创设造纸厂，创设水电厂，培植森林，提倡农田溪河养鱼，改革现有农业、工业。

(四)风景：创设公园，开拓山间交通，培修名胜地点。

(五)人民：皆有知识，皆有职业，皆能自治，皆无迷信，皆忠实做事，皆诚恳对人。

我们的目的：

1、积极方面——提高人们精神上的快慰，改进人们物质上的享用和供应。

2、消极方面——消灭一切罪恶的痛苦”^①。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卢作孚设想的“将来的三峡”实在谈不上多么先进。但是，处在 20 年代内忧外患严重，农村贫穷落后、农业经济濒临破产之时的农村，特别是对于地处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中国西南部嘉陵江三峡地区的农村，这样的构想，已很不简单了。何况，其中不少内容，如“每场（指乡场）皆有图书馆、博物馆、讲演所、运动场”，“人民皆有知识，皆有职业，皆能自治，皆无迷信”等等，不是今天仍须努力才能达到的吗？

1934 年，卢作孚在经过了 7 年多的乡村建设实践，经济文化等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的基础上，他又对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设计了一幅“乡村现代化”的蓝图：

“我们如何将这一个乡村——嘉陵江三峡现代化呢？请看将来的三峡：

1、经济方面：

一、矿业 有煤厂、有铁厂、有磺厂

二、农业 有大的农场、有大的果园、大的森林、大的牧场。

三、工业 有发电厂、有炼焦厂、有水门汀厂、有造纸厂、有制碱厂、有制酸厂、有大规模的织造厂

四、交通事业 山上山下都有轻便铁道、汽车路，任何村落都可通电话，可通邮政，较重要的地方可通电报。

2、文化方面：

一、研究事业 注意应用的方面，有生物的研究，有地质的研究，有理化的

^① 峡防团务会议记录[N]. 嘉陵江报，1929-12-6.

研究，有农林的研究，有医药的研究，有社会科学的研究。

二、教育事业 学校有实验的小学校，职业的中学校，完全的大学校；社会有伟大而且普及的图书馆，博物馆，运动场和民众教育的运动。

3、人民：

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嗜好，皆无不良的习惯。

4、地方：

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①

从卢作孚绘制的这两幅“将来的三峡”的蓝图中可以看出来，他的乡建思想在7年中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他把经济发展由第三位改到首位，这是他“乡村现代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逐渐成熟的具体体现；二是他在发展经济上主张因地制宜。他之所以把矿业放在经济发展的首位，是因为峡区煤炭资源极为丰富，有巨大发展潜力，可成为峡区的支柱产业；三是他既重视经济发展，又非常重视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既重视物质文明的建设，又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他要求峡区人民“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嗜好，皆无不良习惯”；四是他既重视经济发展，又重视环境保护。他要使这个地方“皆清洁，皆美丽”、“皆可游览”。

卢作孚能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中就提出环境保护和环境美的要求，并把它在乡村建设规划中提出来，恐怕是在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五是这些规划虽然目标高远，但又切合实际，可操作性强。从1929年的构想中，有一些想法，如“普及小学教育”，“普及社会教育”，特别是要每个乡场“皆有图书馆、博物馆、讲演所、运动场”，显然有些不切合实际，所以在1934年的蓝图中都一一删去。

值得一提的是，卢作孚不仅对峡区“乡村现代化”制定出一个切合实际的蓝图，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卢作孚也有一个切合实际的考虑。1936年11月，即卢作孚发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提出了峡区“乡村现代化”蓝图2年之后，他又发表了《中国应该怎样办》一文，文中他“画出了两幅图画。一幅是中国的现在，一幅是中国的未来”。在“中国的未来”图画中，他从国防、产业、交通、文化、人民、社会6个方面绘制了中国现代化的蓝图。如在国防上，他提出：“空军：有若干队可任国际战斗的飞机。海军：有若干队在东南沿海可

^① 卢作孚. 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59-360.

任自卫的舰队。陆军：有举国皆兵的征兵制。有完整的现代武器和编配，有战车队和化学战备。”

如在产业上，他提出：“有充足的粮食和燃料，有可以自给的钢铁和其他有色金属的矿产。有各种农产和矿产的原料。有机器耕种的农场，有各种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工厂。有各种调节货物的商业机关，有调节金融的银行。有若干万千瓦的电力供给，有若干万马力的动力供给。”

如在文化上，他提出：“有若干小学校，足容纳全国学龄儿童。有若干中学校，足培养社会需要的青年。有若干大学校，应各种专门人才之需要。有若干研究机关，应各种专门科学的试验、发现和发明的需要。有若干图书馆、若干运动场，若干公园、若干电影院，若干戏院，应一切公共活动的需要。”

对未来中国的人民，他提出的目标是：“有知识，有职业，有勤俭的美德，有健康的体魄，有相勉为善的风气，有忠效人群乃至国家的热忱，决心和勇气。无不良的嗜好，无疾病，无贫穷，无犯罪的行为。”^①

在 30 年代内忧外患形势严峻，整个国家，特别是广大农村处在极其贫穷落后的状况下，卢作孚能够为未来的中国描绘出一个现代化图景，我们不能不钦佩他对“乡村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的超前眼光。

四、布置“三个区域”——造起一个社会理想

卢作孚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曾说：“理想是安慰人的，假若人没有理想，那就痛苦极了”。他对理想的态度是：“把峡区、四川、中国，以至世界变成怎么样的好，我们就照着这理想去做，一直到死就完了，假若还生存在一天，那我们还要协同继续努力，照着理想做下去”^②。

卢作孚“乡村现代化”的理想，集中体现在他“想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他说：

“我们的理想是建设成功一个美满的三峡，是从经济上、从文化上、从风景上、从治安上建设成功一个美满的三峡，我们便要从各方面包围着这整个的三峡活动。”^③

首先，卢作孚在嘉陵江三峡“布置”的“生产的区域”，是因地制宜，实事

^① 卢作孚. 中国应该怎么办[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447~449.

^② 卢作孚. 一个团体的理想[N]. 嘉陵江报, 1929-3-13.

^③ 卢作孚. 我们的要求和训练[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59.

求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经济：

“因为这里有丰富的煤产，可以由土法开采进而机器开采；为了运煤可以建筑铁路；为了煤的用途可以产生炼焦厂；用低温蒸馏可以产生普通用焦，电厂用的瓦斯，各种油类及其他副产品；两个山脉的石灰岩石，山上山下的黄泥，加以低廉的煤炭，可以设立水泥厂；为了一个山脉产竹长亘百余里，可以设立造纸厂；为了许多矿业、工业、交通事业的需要，可以成立电厂；如果在那山间、水间有这许多生产事业，可以形成一个生产区域。”^①

看看后来的北碚，几乎一切都是按卢作孚的这些想法逐一在实现：北碚的煤业，原来是众多小煤矿各自为政，生产管理和生产设备都十分落后，在卢作孚的积极努力和协调下，联合成一个大型现代煤矿——天府煤矿，采用了先进的管理和先进的设备，使煤业成了峡区乡村建设的支柱产业，成了抗日战争陪都重庆的燃料供应基地。为了运煤，一条轻便铁路——北川铁路修筑起来了；为了城市建设，在嘉陵江岸边，一座利用当地石灰岩和低廉煤炭的水泥厂建设起来；为了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木资源，一座造纸厂建立起来；为了利用当地的水力资源，水力电站也建立起来。

卢作孚还以招商引资、合资开发的形式，吸引新的实业项目，使不少工厂企业到峡区落户，以发展峡区经济。这些工厂企业有嘉陵煤球厂、洪济造冰厂、利华玻璃厂、惠利火柴厂、广益化学工业厂、白矾厂、炼焦厂、自然电池厂、霍胥洞水电厂、燧川水电厂、富源水电厂、菜子沟炼钢房、金刚碑王姓炼钢厂、盛敬之铁厂、富毕铁厂、义瑞桐林公司、乐园种植公司以及 9 个砖瓦厂、7 家碗厂、数十家石灰窑等^②。这些工厂企业，为峡区的经济繁荣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把峡区布置成一个“生产的区域”，卢作孚还非常重视为生产服务的公共事业建设。早在 1930 年，他在《乡村建设》一文里的《乡村经济建设》一章中，明确提出“应筹备关于经济的公共事业”，并提出了 6 条具体建议：一是建立气象台。他认为“乡村农人最感痛苦的是天灾，或苦久晴，或苦久雨，或苦风雹，不但是他们无法宰制，亦并无法预料”。而气象台则“可以把最近的将来气象如何变化告诉农人，农人便可对农作设法预备，对灾害设法预防”；二是建立“农事试验场，可以将各种不同的种子不同的播种期，不同的土壤，不同的肥料，

^① 卢作孚. 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36.

^② 黄子棠, 刘选青. 嘉陵江三峡乡村十年来之经济建设[J]. 北碚月刊, 1937 (5).

不同的距离，通通试验出来，比较成绩的好坏，告诉农人，并且指导他们怎样改良种子，改良土壤，改良肥料，改良一切种植的方法，改良农具，期于节省生产费，提高并加多生产品”；三是建立苗圃。“培植各种关于园艺和森林的苗木，指导农人讲求园艺，培植森林”；四是“开辟公用的堰塘或凿公用的井。”并“蓄水以灌农田，或购公用的吸水机”；五是建立农村银行。“在农人青黄不接的时候，贷予款子，并办理存储与汇兑”，解决农民的急需；六是建立合作社。包括消费合作社，以“供给农人廉价的消费品，并分与最后所获的红利”；也有生产合作社，“以公共的保证，帮助需要借款的农人，取得随时可以借款的权利。”

除此之外，卢作孚还提出应指导农人“改良养蚕的方法”而设置公共缫丝厂，公共干茧室；为了“指导农人暇时工作，改良工具和工作方法，制造农产原料，供给农人需要”，他提出要倡办农产品的工厂等等。令人欣慰的是，卢作孚的这些建议以后基本上都一一实现了。峡区不但有了气象站，还有了气象研究所，建立了对农林牧副业进行改革试验性的西山坪农场，建立了峡区农村银行和合作社，建立了黛湖等水利设施，……峡区确实形成了一个“生产的区域”。

在卢作孚的心中，不仅是“盼望这许多事业成功”，而且“是想将这一大幅地方变成一个现代的生产陈列馆，以上一些事业便首先陈列在中间”。^①也就是说，卢作孚要布置成功的“生产的区域”是一个“乡村现代化”的样板。

其次，卢作孚在嘉陵江三峡“布置”的“文化的区域”内容丰富，品位高，而且是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一个优良环境：

“以职业的技能，新知识和群众的兴趣的培育为中心，作民众教育的试验；以教生产方法和创造新的社会环境为中心，作新的学校教育的试验；以调查生物——地上的出产；调查地质——地下的出产，又从而分析试验，作科学应用的研究；并设博物馆、图书馆、植物园、动物园以供参考或游览。如果在那山间、水间有这许多文化事业，可以形成一个文化区域。”^②

卢作孚认为，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来配合，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让经济发展有一个很好的文化教育环境，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而实际上，他的这些“布置”，如开展民众教育和教育改革，开办妇女学校、力夫学校、船夫学校、挨户学校等等。建立科学研究机构——中

^① 卢作孚. 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54.

^② 卢作孚. 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36.

国西部科学院，建设博物馆、图书馆、动物植物园、民众俱乐部、公园、运动场等等，确实都努力做到了。

卢作孚认为“教育应造成环境，无论是学校环境或社会环境。记得有一个教育哲学家杜威曾说：‘教育就是环境’，暗示教育本身，就得天天研究布置环境”^①。卢作孚指的“环境”，也包括要造就一个“现代化”教育的氛围。而一个“文化的区域”的形成，不仅为经济发展，而且也为“乡村现代化”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环境。

第三，卢作孚在嘉陵江三峡“布置”的“游览的区域”，则体现了他的文化艺术修养，特别是审美价值观。他不仅要使这个乡村经济发展、文化发达，而且还要使它环境优美。而如何使环境优美呢？就是在自然美的基础上再加上人工美，形成许多公园。他说：

“凡有市场必有公园，凡有山水雄胜的地方必有公园，凡有茂林修竹的地方必有公园，凡有温泉或飞瀑的地方必有公园，在那山间、水间有这许多的自然的美，如果加以人为的布置，可以形成一个游览区域……于是乎先后经营各种事业了：温泉有公园，北碚有公园，运河有公园，凡有隙地必有园林”……^②

有意思的是，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后发布的第一个文告，不是有关维护地方治安的内容，而是《建修嘉陵江温泉峡温泉公园募捐启》。他要利用嘉陵江温泉、缙云山森林等自然景观与当地古寺、石刻等人文景观打造嘉陵江北温泉公园，开发嘉陵江三峡地区的旅游产业。他亲笔撰写了这一文告，明确指出修建温泉公园的目的：

“学生可到此旅行；病人可到此调摄；文学家可到此涵养性灵；美术家可到此即景写生；园艺家可到此讲求林圃；实业家可到此经营工厂，开拓矿产；生物学者可到此采集标本；地质学者可到此考查岩石；硕士宿儒，可到此勒石题名；军政绅商，都市生活之余，可到此消除烦虑。人但莅此，咸有裨益，事在必举。”^③

由这段话可知，卢作孚要“布置”的“游览的区域”，不是单纯的闲情逸致，游山玩水，而是将其置于一个较高的文化内涵中，将旅游与科学研究、文化、生产活动紧密联系起来。

为了将嘉陵江三峡打造成一个“游览的区域”，卢作孚在峡区大造公园，他

^① 卢作孚. 如何改革小学教育[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641.

^② 卢作孚. 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36-337.

^③ 卢作孚. 建修嘉陵江温泉峡温泉公园募捐启[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54.

要求“温泉有公园，北碚有公园，运河有公园，凡有隙地必有园林”^①，几年之间，他在峡区修建了北温泉公园、北碚平民公园、缙云山黛湖公园、澄江公园、桥头公园、运河公园等等，这还不包括北碚的若干街心花园。他的“凡有隙地必有园林”的气魄令人钦佩。卢作孚有句名言：“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在他心目中，不仅将来有一个美丽中国，最终还会出现一个美丽世界。

通过多年的努力，卢作孚确实把北碚建设成了一个山水园林城市和一个有巨大潜力的游览胜地。早在 1944 年，一家美国杂志就赞叹北碚的优美风光，并认为“除了峨眉山外，北碚最有希望有一天成为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东亚最重要的旅游中心之一”^②。1997 年，北碚被命名为重庆市第一个山水园林式城区，不能不说，应归功于卢作孚当年为把嘉陵江三峡创建成一个“游览的区域”而打下的坚实基础。

卢作孚在乡村建设实验中“想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这不正是卢作孚提出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必须造起产业运动、交通运动、文化运动在乡村建设上的体现吗？

五、卢作孚乡村建设的启示意义

2012 年 9 月，国务院副总理、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在重庆市委召开的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大会上指出：“纵观农业发展历程，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管理方法指导农业，用现代知识提高农民素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这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③

而卢作孚 23 年乡村建设，或多或少符合了这个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了实现“乡村现代化”，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峡区开发矿业、兴建工厂、修铁路公路、建设电站、架设电话、建立农场、农业银行，改进农机具、改良农作物品种、改良土壤，改进农田水利等。

令人惊奇的是，为了促使峡区农业现代化，卢作孚还创办了合作农场，到 1949 年，全峡区合作农场达 82 个，参加农户达 5727 户，占全峡区农民 7395 户的 78.5%。这种合作农场对于“改进技术，建立团体信用，及公共造产，兴办农民福利，养

^① 卢作孚. 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37.

^② 孙恩三. 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J]. 美国 *Asia and America's*, 1944 (6).

^③ 重庆市委市政府召开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大会[N]. 重庆时报, 2012-9-26-7.

成集体生活精神等，均有显著成效”。为了号召全体农民均参加合作农场，他还“实行合作租佃，调整单位农场面积，实施土地重划及举办各作合作业务等，以期充分发挥组织教育及集体改进之功能”^①。

另外，他还在良种推广、防治虫害、保增土肥、农畜保育、农田水利等方面采取了有效措施。更有意思的是，为了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还开展“生产竞赛”，对“养猪、种稻、麦、红苕、玉米、葫豆及其他果品蔬菜等，均于收获时举行竞赛，如有打破上年纪录者，予以重奖，并给以某项‘英雄’头衔。”^②简直让人有时空错落之感。

为了使峡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他还在峡区兴办学校、科学院、博物馆、图书馆、医院、运动场、俱乐部、公园等，使峡区文化教育和百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应该说，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与实践大体上是符合农业现代化发展客观规律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解放前的社会制度之下和整个土地制度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卢作孚却采取了一些“扶植自耕农”和“保障佃农”，“严格管制地主”，“推行二五减租”等等举措。在“扶植自耕农”中，分为“直接扶植”：即“征收朝阳镇 19 保土地 1428 亩划分 73 个单位，农场放与 73 户农人自耕”；还有“间接扶植”：即“凡各镇乡有土地出售时，限制先由佃农取得，计先后购地 2520 亩，扶植自耕农 126 户”。在“保障佃农”中，明确指出“在整个土地问题未获解决以前，本局（指北碚峡防局）曾从事保障佃农工作”，具体办法是：“（一）稳定租佃关系，严格管制地主，不得加租加押与撤佃等事，并已办竣全局农地租约登记，换发统一的三联单式租约，以便管理。（二）推行二五减租：三十七年（1948 年）实施一次二五减租，本年（1949 年）继续办理至为彻底”^③。在旧中国，卢作孚能够实行“严格管理地主，不得加租加押和撤佃”，“推行二五减租”等办法来“扶植自耕农”、“保障佃农”，而不惜触及旧有的社会制度、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这是要有大智大勇气魄的。

卢作孚在峡区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受到海内外瞩目和认可。1948 年，北碚乡建实验区荣膺四川“模范实验区”称号，同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基本教育实验区”。但真正的成就是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① 北碚管理局. 北碚概况报告书（1949）[J]. 卢作孚研究，2005（1）：57.

^② 北碚管理局. 北碚概况报告书（1949）[J]. 卢作孚研究，2005（1）：57.

^③ 北碚管理局. 北碚概况报告书（1949）[J]. 卢作孚研究，2005（1）：51-58.

尤其是峡区的农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1948年11月，即卢作孚乡村建设22年后，晏阳初向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同仁们谈到他头一天在北碚目睹的这一变化：

昨天我在北碚看见从前不识字的农民现在识字了；从前没有组织的，现在有组织了；从前没有饭吃的，现在收入也增加了。一个个地对着我们发笑，使我获得无限的兴奋和愉快。^①

晏阳初在峡区亲眼看到农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在整个民国时期的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能有如此成效，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吧，这才是对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最高评价。

卢作孚对其乡村建设成效也颇为满意。1944年，即他设计“乡村现代化——将来的三峡”蓝图10年后，他不无自豪地说：

“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建设起来，先曾以北碚这个小小的地方作一度经营的实验，悬出一个理想，叫作‘将来的三峡’。最初进行起来颇困难，但毕竟能建设成功一个这样的局面。……两三年内完全实现了原来的理想，甚至超越了原来的理想。从这个小小地方的经营，可以证明：中华民国是可以建设得起来的，是能够建设得起来的；使别的国家也认识中国，必决有希望，有前途。”^②

卢作孚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也实际上在努力达到他提出的“供中华民国里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经营的参考”^③，即努力成为民国时期全国乡村建设样板的目标。

应该说，卢作孚的乡村建设之所以在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异军突起，成就大、成效好，持续时间长，有三个方面令人深思：首先，是他始终保持其高远而符合国家和乡村发展规律的奋斗目标——中国现代化、中国农村现代化，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建设模式来努力达到这一奋斗目标。

其次，是他一以贯之始终坚持“微生物”的社会改良方式，以渐进的、全力建设的方式来达到其奋斗的目标。可以说，不管远去的历史，还是近现代历史，都证实了一个真理：达到一个积极、健康的变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改革改良有时比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更加有效。正如有学者所说：卢作孚“‘以建设的

^① 晏阳初. 目前乡村建设的重要性[A]. 晏阳初全集(2)[M].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344.

^② 卢作孚. 国际交往与中国建设[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577.

^③ 卢作孚. 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53.

力量作破坏的前锋’，用渐进的办法来达到履行社会，强国富民的目的。观卢作孚的一生，无论在实际操作层面还是思想理论层面，无论在经济建设领域和文化领域，他都始终坚持以这个原则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从不偏离，从不放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①。

第三，是卢作孚与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不是把乡村教育作为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而是把“国家现代化”、“乡村现代化”作为乡村建设宗旨。为此，他在乡村建设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而且以北碚作为中心进行城市化建设，作为带动整个峡区乡村建设的核心经济圈和经济增长点；他以民生公司总经理的身份，从经济实力、技术力量多方面支持峡区乡村建设。他的以工辅农的做法，也达到了互利双赢的效果，而卢作孚在峡区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使峡区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这都表明了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然而坦率地说，在民国时期那个政治黑暗、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的年代，尽管卢作孚为“乡村现代化”作了最大的努力，但这个理想也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实际上，包括卢作孚在内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都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的。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正是在乡村建设运动处在高潮阶段时，就有学者发出了“乡村建设之路走得通吗”的疑问。认为“近年来风起云涌的乡村运动，并不能解决农村中大多数穷人的吃饭问题”^②。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所以不能现代化，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的桎梏束缚与残酷的侵略榨取，实为一大原因。其次，残余的封建势力对于民族资本主义，也还具有很大的反动作用，其表现于政治的是军阀政治与官僚政治之延续；其表现于经济的则是一切残酷的榨取——地主、豪绅、贪官、污吏，以至大小军阀对农民、商人，与民族企业家剥削压榨。”^③正因为如此，当时就有学者认为中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有下列“先决条件”要解决：“1. 有统一的政治与贤明的政治；2. 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3. 改革土地私有制度；4. 铲除商工资本的榨取形式。”^④虽然卢作孚的乡村建设因种种主客观原因获得很大成就，很好的成效，但在当时这些“先决条

^① 卢晓蓉. “以建设的力量作破坏的前锋”——试析卢作孚的建设观[J]. 我的祖父卢作孚[M].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 242.

^② 孙晓村. 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估价[A]. 孙晓村纪念文集[M].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3: 322.

^③ 杨辛之. 论中国现代化[J]. 申报月刊, 1933 (7).

^④ 吴觉农. 中国农业的现代化[J]. 申报月刊, 1933 (7).

件”都未解决的情况下，“乡村现代化”的理想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难以推广，更不可能改变整个中国乡村的悲惨命运。

尽管如此，也不能因此否定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诚如有学者所言：“在旧中国，只要是在实现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这个目标下，许多‘政治改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改造中国的问题，仍然在某些方面起过有益的作用。”^①只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城乡统筹、构建和谐社会、工业反哺农村、城市带动农村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下，中国农村才有可能真正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

2012. 11. 14

^① 金冲及. 中国近代的革命与改革[N]. 光明日报, 1990-12-5.